

# 美国国名译法在近代中国的滥觞、嬗变与确立

王 剑<sup>1,2</sup>

(1.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2. 美国康奈尔大学 比较文学系, 纽约州 伊萨卡 NY14853)

**摘 要:** 从地理学术语翻译的角度出发,以概念史的方法探讨了“美国”一词在中国近代文化背景下生成、演变和确立的历史过程。分析认为: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对译名的影响、政治和外交层面对译名的操控以及学者和文人对译名的规范与统一是“美国”译名演进的3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们对现代汉语体系中“美国”一词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关键词:** 地理学; 术语; 翻译; 美国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2)04-0117-08

由于地理环境与生俱来对自然的依赖,人类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很多学者看来,“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因素是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地理环境”<sup>[1]</sup>。因此,中西方人在与自然地理互动的历史过程中都通过不断地观察、总结和积累发展出与其自身生存环境相应的地理学。相比而言,“在中世纪的早期,中国人曾一度遥遥领先。从汉到唐的这一段时期里,西方在地理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中国。到了宋代,除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和中国相比”<sup>[2]</sup>。但由于古代地域的阻隔,往来交通不便,中国的地理学并未大规模地向西方传播。倒是近代以来,由于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航海技术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西方人通过地理大发现率先扩大了生存空间,扩展了对世界地理的认识范围。相比科学技术武装下的西方近代地理学体系,中国传统地理学越发显得封闭而狭隘。

明代中期以降,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作为其概念表征的新术语,诸如“地球”、“半球”、“赤道”、

“南极”、“北极”、“热带”、“寒带”、“经线”、“纬线”、“大洋”、“大洲”等大量地理学词汇也通过翻译为媒介在汉语语言系统中生成<sup>[3]</sup>。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眼里的世界图景:中国传统的以华夏为中心向四夷辐射的文化圈“天下观”被主权国家平等并立的“世界观”所取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国”、“万国”和“国际”的概念。而中国自古乃“名教”之国,自孔子始就有对万事万物“必也正名”的思想传统。明清之际,面对西方列强环伺的国际局面,对于林立于世的西方诸国如何称呼其名便成为中国处理与他国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关系的首要问题。从逻辑上讲,任何国家自成立起都必然有着自己的正式国名,而其中文称谓往往来源于对其固有名称的翻译。今天汉语里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国名术语,如“英国”、“法国”、“俄国”等,就是在明清之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背景下翻译生成的。

而现代汉语中的“美国”一词也不例外。今天的美国,其英文名称与美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各国冒险家纷纷进行海洋

收稿日期: 2012-09-40

基金项目: 2012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2012]3013)

作者简介: 王 剑(1983-) 男,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研究生。

探险活动。1498 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远航印度,途中在巴西登陆。船上的意大利商人兼探险家亚美利哥发现这是一块有别于亚洲的新大陆,并绘制出其地图。亚美利哥回国后大肆渲染他的南美洲之行,其故事“既使欧洲人恐惧,也令他们着迷”,并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sup>[4]</sup>。1507 年,德国地理学家瓦尔德希米勒在其绘制出版的世界地图和相关著作中首次使用亚美利哥名字的拉丁文形式“Americus”来指代美洲,后来演变成英文中的“America”一词<sup>[5]</sup>。于是,亚美利哥的名字就成为今天 2 块美洲大陆的名称。而美国正是以美洲而得名:1776 年,美国宣布独立。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首次将之前的北美 13 州殖民地称为“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up>[6]</sup>。这一称呼在 1783 年英美《巴黎条约》中得以沿用<sup>[6]</sup>,并于 1878 年的《美国宪法》中被确认为美国的正式英文国名<sup>[6]</sup>。因此,“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特别是其中的“America”即成为后来种种美国汉译名的源语文本。

从 1784 年中美首次民间直接交往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即便从 1979 年两国正式建交到现在也已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今天中国人的生活和意识里早已随处充斥着“美国”话语,并且挥之不去。若追问大洋彼岸那个叫做“America”的国家何以一旦进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就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必然被人讥为无知。因为翻开今天的任何一部双语词典,“USA”旁“美利坚合众国”的注解抑或“America”旁“美国”的译名似乎都在赫然宣告着“美国”作为那个北美合众国在华代理人的合法地位。根据传统翻译理论,“America”和“美国”这 2 个来自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文化背景的词汇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而“透明”的“等值”,因此,以“美国”对译“America”被视为当然。诚然,“美国”作为“America”的汉译名已经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在现代汉语中安营扎寨,成为事实。但是,需要看到的是,这 2 个词语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对等,其互译性并非在某本权威词典一蹴而就之下就能得以建立。相反,不同文化中概念与概念、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对等只是一种动态的“虚拟对等”<sup>[7]</sup>①,其“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sup>[8]</sup>。而作为建立这种对等关系的手段,翻译归根到底是一种“制约之下的形变”<sup>[9]</sup>②。每一个概念从一种语言系统进入另一系统,其语言形式的转换都受到一系列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都是这些因素之间长期博弈斗争的产物。因此,一个民族对异文化词语的翻译和接受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个过程,钱钟书以旅行作喻再恰当不过。他说“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

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些遗失或受些损伤。”<sup>[10]</sup>

笔者既以“美国”一词的翻译为例,探讨“America”这一西方地理学概念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怎样的方式、穿过数百年时间、跨越上万里大洋、一步一步“积寸累尺”地向中国旅行,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sup>[8]</sup>,进而最终进入中国人的话语系统。

## 一、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 对译名的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对新生事物怎么命名,总是与人们对该事物的认知与了解程度、情感价值判断以及传统审美积淀等因素密切相关。译名也是如此:一个外来名词术语也总是随着人们对其所指称实体认识的不断加深以及情感态度的不断变化而在译入语中产生着不同的“形变”,这也是影响美国译名在近代中国演变的主要因素。从 16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而来,中美 2 个民族的交往经历了从间接到直接、从表层到深入的发展过程。而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也从最初耳闻目见的直观了解,发展到感性判断,进而最终上升到理性思考。与之相应,“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汉译名也经历了译名纷乱的初创时期、贬词丑化的转折时期和褒义美化的定型时期 3 个阶段。

### (一) 第一阶段:译名纷乱的初创时期

译名纷乱的初创时期约从明朝中期到 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之前,历时 200 余年,为美国汉译名的初创时期。在明朝,美国尚未成立。从明朝中晚期开始,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大发现的是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他们的地理学“汉文西书”<sup>③</sup>中,利玛窦、艾儒略等根据音译的原则,将美洲洲名“America”以汉语表述为“亚墨利加”,如早在 1602 年,由利玛窦绘制、李之藻刻版的《坤輿万国全图》就已经筚路蓝缕,其对包括美洲在内的世界五大洲介绍

① 英文原文为“hypothetical equivalence”。

② 英文原文为“a regulated transformation”。

③ “汉文西书”的概念,据邹振环解释,主要“用于明末清初,指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包括有原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类图书”。参阅: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5 页。需要说明的是,无论这些“汉文西书”整本著作有无原本参照,就其中的重要概念术语(如“美国”等)而言,最初都是外国所有而中国所无,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的。

道“以地势分與地为五大洲,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泥加。”<sup>[3]</sup>而且利玛窦专门提到美洲时说“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sup>[3]</sup>并且“南北亚墨利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sup>[3]</sup>。

在成书于1623年的地理学著作《职方外纪》中,传教士艾儒略最早以汉语描述了美洲,因意大利商人亚美利哥而得名的史实。他沿用“亚墨利加”的美洲译名,并且首次将北美洲称为“北亚墨利加”。艾儒略说“其后又有亚墨利哥者,至欧逻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利加。数年之后,又有一人名哥尔德斯,国王仍赐海舶,命往西北寻访,复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即北亚墨利加”<sup>[11]</sup>。其后,意大利传教士庞迪我在其《海外輿图全说》以及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其《坤輿全图》中都沿用了相同的译名。逐渐,“亚墨利加”成为“America”汉译名的雏形,相继出现在后来来华传教士的口中、笔下。只是不同传教士在拟声对译的具体用字上略有差异,表现为“墨利加”与“美理哥”等类似变体。

在同一时期,中国近代最初与西方人士直接接触的澳门、广东等沿海地区居民根据传教士口中的发音,以当地闽粤方言将“America”音译为“咪喇坚”<sup>①</sup>,如《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757)广东“弩获诈抢咪喇坚夷船匪犯李奉广等,分别斩决梟示”<sup>[12]</sup>。“咪喇坚”也写作“弥利坚”或“米利坚”,或直接简称为“米国”,这也影响到了后来日本对美国国名的翻译。

其实,在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之前,中美两国并无直接往来。即便有茶叶、人参等货物的零星贸易往来,中国与北美13州殖民地之间都是经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伦敦为中介辗转往来的。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停留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阶段。而且由于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在当时中国人普遍看来,“凡属夷人,都不过‘犬羊之性’而已,何必究其属于那一个‘部落’”<sup>[13]</sup>。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美国的汉译名都是以“亚墨利加”、“墨利加”和“美理哥”的形式存在于中外知识精英圈子里,或以“咪喇坚”、“弥利坚”和“米利坚”等形式存在于沿海地区少数与西方人士有所往来的中国人口笔之下。

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商船第一次抵达中国广州<sup>[14]</sup>,拉开了中美直接交往的序幕。直到1844年中美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的60年间,双方贸易往来日趋频繁,两国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出于贸易通商的迫切需要,“中国人伤了一点脑筋之后便识别了美国人与英国人,他们称美国人‘新国民’”<sup>[15]</sup>。同

时,当地居民根据美国国旗的直观特征,将其称之为“花旗”国。如最早对独立后的美国进行记载的《海外番夷录》中所说“咩哩干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哩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sup>[16]</sup>。其中,“咩哩干”亦为美国的音译,只是后来未能流通使用。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其撰成于1838年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对美国汉译国名进行了详细考证。他说“夫美理哥合省之名,乃正名也。或称米利坚、亚墨理驾花旗者。盖米利坚与亚墨理驾二名,实土音欲称船主亚墨理哥之名而讹者也。至花旗之名,则因国旗之上,每省有一花,故大清称为花旗也。至所云美理哥者,即亚美理哥也。合省者,因前各治其地,国不相连,政无专理。后则合其省而以一人为首领,故名之曰合省。是则今之称美理哥者,固正而不讹。后云合省者,亦正而不讹也”<sup>[13]</sup>。其分析不仅涉及“花旗”一词的来历,“America”的诸多汉语音译名,更进一步阐明了美国作为“合省”国的国家性质,为后来者理解美国的渊源本质和翻译美国的国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经世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介绍美国部分时,他也对美国和美洲的译名加以辨析道“案粤人称曰花旗国,其实弥利坚,即墨利加。又作美理哥,乃洲名,非国名也”<sup>[17]</sup>。并且,魏源借鉴并沿用了裨治文的说法时称“西洋称部落曰土迭,而弥利坚无国王,只设二十六部头目,别公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名其国育奈士迭国,译曰兼摄邦国”<sup>[17]</sup>。其中,“育奈士迭国”乃“United States”的音译,魏源将其进一步意译为“兼摄邦国”,相当于今天所谓“合众国”。只不过前者“育奈士迭国”作为汉译国名用词略显冗长,而后者“兼摄邦国”因其意义较为晦涩而均未能广泛流通使用。

随着中国人对美国认识的逐渐加深,美国汉译国名也开始逐渐细化。梁廷枏《海国四说》中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在该书中,梁廷枏对美国汉译名的音译用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粤人呼为花旗者,以其入市船旗必绘彩花其上,俗遂指是名之。其自称则为合省国,复先系以亚墨理格洲,谓必如此乃为正名。盖亚墨理格即船主亚墨利哥之转音。其曰亚麦利加者,加格为四声之通,亚麦即亚墨,利即理译语对音,本无定字也。曰米

① 据原书记载,“坚”字和“咪”、“喇”两字一样,为闽粤方言,也带有“口”字旁,并且原文为繁体“堅”。

利坚者,米即亚墨合呼,而急读之,则为米、坚、加,又复以转而误也。近年粤商久于海外操西洋土音,别呼之曰美哩干。美与米无异声,而与亚墨同为开口之声,亦缘急呼致省,其曰哩干,则明为利坚之转矣。曰合省国者,知中国分省以治,故亦自称其国内所分之地为省。前分后合,从质即以合省名”<sup>[18]</sup>。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也归纳总结道“米利坚,米一作弥,即亚墨利加之转音,或作美利哥,一称亚墨理驾合众国,又称兼摄邦国,又称联邦国,西语名育奈士迭。亚墨利加大国也。因其船挂花旗,故粤东呼为花旗国”<sup>[19]</sup>。

在1602~1844年长达200多年间,美国由英属殖民地发展为独立国家,中国人由美洲进而认识了美国。对美国的汉语称呼也是译名纷繁,包括西方传教士口中的“亚墨利加”、“墨利加”、“美理哥”,闽粤沿海居民口中的“咪喇坚”、“米利坚”、“弥利坚”以及经世学人口中的“育奈士迭国”、“合省国”、“兼摄邦国”等不一而足。关于译名纷乱的原因最主要在于术语翻译之难。试想一个异文化、新事物、新概念初次进入中国人视野,要想对其准确地加以理解与把握已属不易,何况用母语进行表述;能够勉强转换成汉语者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要求其高度符合汉语规范并前后统一一致。对此,最早在中国从事西方地理学译述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感叹就是最好的注脚,他在其所译的《几何原本》引言中认为“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强;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sup>[20]</sup>并且,当时翻译理论还不够发达,没有一定的翻译标准可循,因此,才有了美国汉译国名在中国草创之初纷繁复杂的局面。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内中美之间主要是民间的商贸往来,中美关系尚未深化进入政治外交层面,中国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印象仍处于直观认识阶段。因此,即便这时的美国译名纷繁各异,但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论“米利坚”、“育奈士迭”等拟声音译,还是“合省国”、“兼摄邦国”等意译,乃至“花旗国”等借代称谓都是对对方的直观描述,并且所选汉字本身均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随着中西交流以及以此为背景的中美交往的深化,这些早期译名大部分都在时代的演变过程中被逐渐取代或淘汰,如今提起“亚墨利加”,也许只能遥远地呼应着早期西方探险家开疆辟野的雄心壮志和浪漫情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略显粗糙的音译名词为后来的美国译名奠定了基础。

## (二) 第二阶段:贬词丑化的转折时期

贬词丑化的转折时期大致从1844年中美《望厦

条约》的签订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前,为美国汉译名从草创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拉开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历史,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痛恨。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国家音译国名的基础上冠以“夷”、“酋”、“逆”等字加以贬斥,如林则徐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上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就经常将英国称为“英夷”<sup>[21]</sup>。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夷夏”之辩,将“华夏”以外的其他民族均视为“蛮夷”,但是这更多是出于一种自我优越感以及对边缘文化的蔑视。但到了近代,同一个“夷”字所折射出的感情色彩已由之前的轻视变为愤恨。如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阮元致两江总督伊里布,建议联美制英的文书里就同时以“英夷”和“咪夷”来称呼英美二国,他说“咪夷在粤向属安静,非若英夷之顽梗。若优待咪夷,免其货税,又将英夷之贸易移给咪夷,则咪夷必感荷天恩,力与英夷相抗”<sup>[22]</sup>。但总的说来,在1840~1844年间,“中华民间对美国的印象,较之对其他各国为佳”<sup>[13]</sup>,因此,夷称并未广泛使用,而是第一阶段产生的主要音译美国国名大都得以沿用。

1844年,中美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五口贸易章程》(俗称《望厦条约》)签订,在条约里美国的中文落款为“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sup>[23]</sup>。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一汉译美国国名,虽然其“America”部分仍然沿用了第一阶段的音译形式“亚美理驾”,但是在其国家性质“The United States”这一部分已经由之前的“合省国”、“兼摄邦国”等表述演变成了今天的“合众国”。只是出于强权压迫和外交礼节,当时所签订的条约上美其名曰“大合众国”。该条约中,最惠国待遇、关税协定和领事裁判权等条款都反映出平等条约性质<sup>[23]</sup>。因此,从清政府到民间都开始逐渐意识到,美国同英法日俄等西方列强一样,它与中国的交往也是以攫取经济利益、瓜分中国国土为目的。从此,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亦开始发生转折。自上而下从官方开始,对美国的称呼也在第一阶段音译国名简称的基础上加上“夷”、“酋”等贬字,普遍称其为“咪夷”、“咪酋”等。如《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记载,1844年道光皇帝曰“惟扼○晒使臣喇吃呢,据咪夷声称约计一月后可以到粤,似与咪夷通同一气。”<sup>[12]</sup>又如《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记载,1857年咸丰皇帝曰“来自黄浦,恳求开舱贸易,经叶名琛照覆,咪酋颇知感戴。”<sup>[12]</sup>

虽然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较短,仅仅20余年,但是这一时期却是美国汉译国名从最初创制到最终确立之间的重要过渡阶段。“咪夷”、“咪酋”等词也是美国汉译名在近代中国演变的重要历史产物,这些具有

贬斥丑化效果的译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感排斥。

### (三) 第三阶段: 褒义美化的定型时期

褒义美化的定型时期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为美国译名在汉语体系里的确立和定型时期。19世纪60年代,清王朝经历了反抗国外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陷入到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之中。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封建统治阶级内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产生了以夷为师和学习“夷务”、以抵御外侮和消除内患的理性思考。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已经悄然由蔑视贬低转变为畏惧重视,这种情感的变化也反映在洋务派对美国的称呼上。

早在咸丰十年(1860)洋务运动发起者曾国藩在《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的奏折上就说道“其请拨夷兵三四百名助剿金陵发逆心节,查大西洋英法美各国,恃其船坚硬大,横行海上。”<sup>[24]</sup>在这里,曾国藩开历史先河,以单字“美”指代美国。已经与今天国人对美国的简称无异,只不过此处“美”和“国”二字并未连用。在同一篇奏折中,曾国藩更是将“米利坚”和“美理哥”2个早期译名斩首去尾,分别保留了其具有褒义的部分,并合二为一,将“美”、“利”、“坚”3个褒义汉字连用,较早得出了今天所使用的美国汉译名全称,他说“美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余中国素称恭顺。”<sup>[24]</sup>而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的奏折中则直接将“美国”二字连用,得出了今天所普遍使用的美国汉译名简称,奏折中说道“查美国新立合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只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等语。”<sup>[25]</sup>由此,曾国藩号召国人师从美国的迫切心情从其用词称名上就可见一斑。

另一名洋务大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的奏稿《筹议海防折》也使用“美国”的称呼:“陆路行仗小炮,则以德国克鹿卜四磅弹后门钢炮、美国格林连珠炮最为精捷。”<sup>[26]</sup>而中国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拟陈洋务疏》则称之为“美利坚”:“驻扎西洋公使,万非今日急务。其间惟美利坚之金山,中国流寓数万人。”<sup>[25]</sup>

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渐深入,中国知识界也广泛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开始逐渐改变了对西方国家的立场,这同样体现在他们对美国的汉语称呼上,如著名洋务派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论及西

方兵政时就直接以“美国”作为称呼:“至于洋枪,从前皆用前膛,自美国林明敦秘薄马地尼后膛枪出,各国仿效之。”<sup>[27]</sup>

可以说,正是洋务派官员和学者奠定了以褒词汉译美国国名的基础。他们的译名影响了当时从官方到民间的各种典籍。据考证,在主要记录洋务派文章的《清朝经世文编》、《清朝经世文续编》以及《清朝经世文三编》等书中,第一、二阶段的直观音译名和贬词丑化译名几乎都被“美国”和“美利坚”这2个褒义词所取代<sup>[28]</sup>。而“美国”、“美利坚”等译名也被后来的维新派人士继承沿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特别是后者在晚清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中都使用了“美国”和“美利坚”等具有褒义的汉译国名,使得这一国名在近代中国最终确立起来。

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中国人对美国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民族情感的不断变化,美国的汉译名也经历了初创、转折和定型3个时期。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认知程度的深入、情感态度的变化还是语言习惯的演变都是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因此,以时间和历史事件为标志,将美国汉译国名的确立划分为3个时期只是出于讨论问题的方便。事实上,不可能随着后一时期的到来,前一时期的译名就完全废除作古。上文提及的大多数译名在不同的时期都同时存在过。但是,一个总体趋势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从初创时期的直观描述,到过渡时期的贬低丑化,再到定型时期的褒义美化,每一个时期的译名变化都反映着国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知和情感,他们对美国认知程度的深入和情感态度的变化是导致其汉译国名随之演变的最主要原因。

## 二、政治外交层面对译名的干预

就翻译而言,英国的翻译理论家 Theo Hermans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都意味着出于某种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的操控。”<sup>[29]</sup>①而美国汉译国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确立也不例外:它不但是语言随思维自发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其他各方面因素有意“操控”的产物。所谓“操控”,是指翻译不仅仅是在真空状态下对源语文本的再现,而是受到2种文化里“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宏观因素”(Bassnett & Lefevere, 1990:11)的制约<sup>[30]</sup>②。就有可能对翻译起到“操控”作用的这些因素,比利时翻译学者 André Lefevere 更加具体地总结出“权力”、“意识形

① 英文原文为“All translation implies a degree of manipul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for a certain purpose”。

② 英文原文为“the larger issues of context history and convention”。

态”和“机构建制”3个方面<sup>[31]</sup>①。而在美国汉译名的形成过程中,来自第一个方面,即历史上西方列强从政治外交途径对其国家汉语名称的干预也是影响其译名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这也主要影响到第二阶段对中国人所使用的贬义与丑化译名的废止。

早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起,英美等西方国家就开始强调所谓的“平等”,并且以势压人,通过其外交强权对中国官方用语强加干涉,多次要求废除在他们看来在双边交往中带有歧视性的字眼。如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第三十条要求废除“禀”字“嗣后中国大臣与合众国大臣公文往来,应照平行之礼,用‘照会’字样……均不得欺藐不恭,有伤公谊。”<sup>[23]</sup>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七款也以同样的文字重申了同样的规定。英美等对中国一个“禀”字的使用尚且如此耿耿于怀,其对中国人如何称呼其国当然更是忌讳颇深。在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便明确提出“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sup>[23]</sup>同为西方列强的美国自然也紧随其后,通过外交途径向清廷官方施压,要求废止“咪夷”、“咪酋”等对其国家有意贬低与丑化的汉语译名。

当然,这种政治上的干预与操控最初只是体现在官方之间的书面条约上,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已经确立起来的贬词或丑化译名一夜之间彻底作古。因为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和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都不可能随着一纸条约的订立而立刻改变,但是,不容否认,正是由于对方外交政治层面的持续干预,加上后来洋务派的鼓吹,最终改变了晚清中国官方对美国的贬义译名,进而逐渐影响了整个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称呼。

### 三、学界文人对译名的规范与统一

除了来自政治外交方面的影响之外,另一个对美国汉译名演变的“操控”因素来自于学术界,即学者文人对语言的整肃和对译名的规范,这使得第一阶段初创期纷繁复杂的音译名的逐渐统一。

明末清初以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就开始传入中国。然而“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sup>[32]</sup>。可见,科技术语翻译之难。到了清末民初,随着中西方接触的深入以及西学东渐大潮的到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术语也大规模进入中国。然而,由于西方“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sup>[20]</sup>,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对译之难更是可想而知。即便勉强译出,不同译者的译名也很难统一与一致。一时间,中国出现了“同此

一物,二书各异”<sup>[25]</sup>的“译名纷乱”时期。

作为“一门跨越自然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sup>[3]</sup>,地理学方面的术语翻译的情况更是如此。对于地理学术语的翻译之难以及译名之不统一,徐继畲根据自己编辑《瀛寰志略》时的亲身经历指出“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字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者,而中国无此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展转混讹,遂至不可辨识。”<sup>[19]</sup>高凤谦也认为“地名人名,有音无义,尤为混杂。西人语言,诘屈聱牙,急读为一音,缓读为二三音;且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即一人译之,而前后互异。”<sup>[25]</sup>而在其初创期,“亚墨利加”、“墨利加”、“美理哥”、“亚墨理驾”、“咪喇坚”、“弥利坚”、“米利坚”、“咩哩干”、“育奈士迭”等纷繁各异的美国音译名就是其中典型一例。这些音译词纯取字音,不顾含义,用字生僻,且长短毫无章法,大多数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积淀和语言表达习惯,译名的混乱和不统一对中美双边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实践都造成了极大影响。

因此,鸦片战争以后,特别从洋务运动开始,随着翻译西方书籍日益增多,译名统一问题逐渐成为当务之急,并且越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傅兰雅、康有为、马建忠、吴汝伦、严复、高凤谦、梁启超等都在译名统一问题上做出过有益的尝试。关于西方国名和地名的翻译,学者们普遍建议,源语应该是以英语发音为标准,而目标语(汉语)则应以京音汉字进行对译。如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指出“宜将罗马字母编为一书,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国用英语为主,以前此译书多用英语也;中国以京音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兹以后,无论以中译西,以西译中,皆视此为本。即一二音不尽符合,不得擅改,以归划一。”<sup>[25]</sup>因此,以“美利坚”取代初创时期的“咪喇坚”、“米利坚”、“弥利坚”等众多音译,既是由于认知程度的深入意译取代音译的结果,也是语言伴随着民族感情发生褒义变化的结果,还是学者们对译语进行规范与统一之后京音取代闽粤音的产物。

### 四、反 思

严复当年谈翻译时曾发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sup>[20]</sup>的感慨。可见,要凭借个人一己之力完成任何

① 英文原文分别为“power”、“ideology”以及“institution”。

一个名词术语的翻译与创制,其耗时之长、困难之巨。即便像“美利坚合众国”或其简称“美国”这样一个在今天被视为“透明”的地理学术语,从大洋彼岸漂洋过海进入中国人的话语体系,也是经过了数百年轰轰烈烈而又艰难曲折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sup>[28]</sup>。从汉字训诂的角度出发,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sup>[33]</sup>。而就“美国”这一地理学术语的翻译而言,似乎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翻译一字,即是作一部美国文化东渐史、一部美国文化的中国受容史。因为作为近代以来绝大部分中国人借以思考和谈论美国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sup>[34]</sup>,美国国名在中国“积寸累尺”的翻译与创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国家文化形象在中国的建构和接受过程。其国名汉译的每一次演进以及用字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微妙而深刻地反映着西方来华传教士、清廷皇帝、经世派官员学人、洋务派大臣学者、维新派人士以及平民大众等不同社会群体对美国认知程度和情感态度的漫长变化历程。因此,本文承袭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sup>[35]</sup>的传统,沿波讨源地考察了“美国”译名在近代中国生成、演变和确立的过程,并且从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对译名的影响、政治与外交层面对译名的操控、学者文人对译名的规范与统一等3个方面分析其译名演进的原因,以期对当今中国人话语系统中“美国”一词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至今160余年,“美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俨然已成为“America”和“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中国的权威译名和正宗代理。究其缘起,洋务派出于号召国人师从西夷,因而推波助澜对其国名极力美化与求雅,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情有可原。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因袭沿用并且习焉不察地将本民族字典里几乎最美好的字眼都附加在大洋彼岸这个北美合众国身上,这一做法是否妥当确实值得商榷。需知语言文字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文化都有着强烈的“反构”作用,“它是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地暗示人类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建构自己的文化”<sup>[36]</sup>。如果说历史上“咪夷”、“咪酋”等贬义译名曾诱导酝酿出中国人妄自尊大进而闭关锁国的苦果,那么今天“美国”或“美利坚”等绝对褒化的译名似也正暗示着国人一切以“美”为准、一切向“美”看齐的不良效应。当然,不得不承认,在现代汉语体系中,“美国”的译名已经是历史地、人为地、约定俗成地建立起来,断然难以更改。但是若清醒而理性地思考,也许在符合汉语表意规范的前提下,采用不含明显褒贬色彩的汉字拟声对译,回归“亚墨利加”等不卑不亢的音译词才是

国名翻译的正道。

## 五、结 语

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中早已充满着“美国”话语。本文从地理学术语翻译的角度出发,以概念史的方法探讨了“美国”一词在近代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成、演变和确立的历史过程。认知程度和民族情感对译名的影响、政治外交层面对译名的操控、以及学者文人对译名的规范统一等是“美国”译名演进的3个主要原因。在对现代汉语体系中“美国”一词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符合汉语表意规范的前提下,采用不含明显褒贬色彩的汉字拟声对译,也许是国名翻译的正道。

### 参考文献:

- [1] 辜正坤. 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2]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5卷[M]. 刘晓燕,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3] 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4] 威廉·J·本内特. 美国通史[M]. 刘军,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 [5]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 [M]. Lond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2.
- [6] Susan R.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ical documents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
- [7] Liu L H.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8] 刘禾. 语际书写: 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 [9] Derrida J. The ear of the other: 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 translation [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 [10] 钱钟书, 郑振铎, 阿英, 等. 林纾的翻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11] 艾儒略. 职方外纪校释[M]. 谢方,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12] 佚名. 清实录: 仁宗睿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3] 李定一. 中美早期外交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4] Latourette K S.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5] 赖德烈. 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 ~ 1844) [M]. 陈郁,

-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16] 谢清高. 海录校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7] 魏 源. 海国图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 [18] 梁廷枏. 海国四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19] 徐继畲. 瀛寰志略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 [20] 罗新璋. 翻译论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21] 林则徐. 林文忠公政书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1.
- [22] 胡秋原.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 [M]. 台北: 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
- [23]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1 册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
- [24]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 第 2 部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 [25] 郑振铎. 晚清文选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26] 李鸿章. 李文忠公选集 [M]. 台北: 台湾大通书局有限公司, 1987.
- [27] 郑观应. 盛世危言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28] 冯天瑜, 刘建辉, 聂长顺. 语义的文化变迁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29] Hermans T.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85.
- [30] André L.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31] André L.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32]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33] 陈寅恪. 陈寅恪集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34]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35] 章学诚. 校雠通义 [M]. 北京: 古籍出版社, 1956.
- [36] 辜正坤.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Creation, evolu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pre-modern China

WANG Jian<sup>1 2</sup>

(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14853, New York State)

**Abstract:**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geographic nomenclature and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conceptual hist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creation, evolu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d “meiguo”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re-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he manipulation from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aspects, and the regulations imposed by intellectuals and literati are the three chief causes for the lexical change of “meiguo”. Hopefully, this article will bring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word “meiguo” in the system of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geography; nomenclature; translation; America